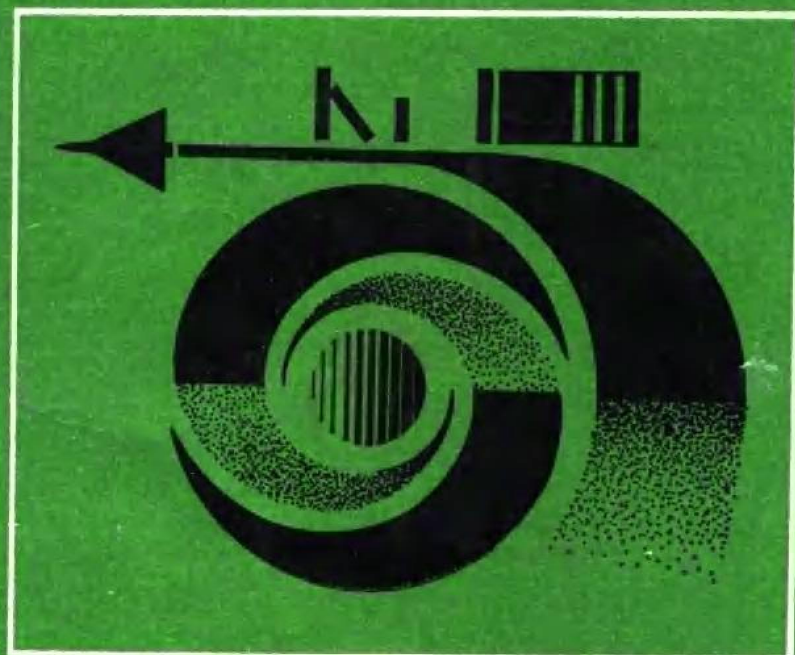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现代化 理论研究

〔美〕罗伯特·海尔布 罗纳 等著
俞新天 邓新裕 周锦猷 译



华夏出版社

现代化理论研究

WENKU.

〔美〕罗伯特·海尔布 罗纳 等著
俞新天 邓新裕 周锦敏 译

责任编辑：志 华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徐天离

现代化理论研究

〔美〕罗伯特·海尔布罗纳 等著

俞新天 邓新裕 周锦礞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六〇三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印张 204千字 插图3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8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1—3700册

ISBN7-80053-528-2/Z · 050

定价：4.95元

序 言

经过一百余年的痛苦摸索，饱经忧患的中华巨龙开始腾飞了！它一往无前地投入奔腾咆哮的世界现代化大潮之中。与此同时，在神州大地上，现代化研究方兴未艾。但是，由于伟业初创，百废待兴，现代化方面的理论著作，仍然寥若晨星。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打开窗口，面向世界，首先翻译、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现代化经营有年，各有特色，成败功过，利弊得失，足供借鉴。因而，我们编译这本文集。

现代化研究涵盖面极大，内容十分丰富，以一本小书而对它进行全面介绍，似无可能。但如只作专题介绍，则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上述问题，我们确定了这样的选编方针。第一，我们基本上根据现代化的模式，将所选文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问题，第二部分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第三部分是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各部分文章之间的内容又都有交叉、渗透、比较和重叠，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每一部分由若干篇不同领域的文章组成，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现代化理论的多彩丰姿。正因为着眼于现代化的三大模式，因此所选文章皆为一般理论的阐述，各国个案均不列入。第二，为了充分反映国外研究的学术水平，我们尽量选择享有国际盛誉的学者的名篇，或者能反映某一领域概貌的力作。第三，为了忠实地介绍国外专家的思想，我们编选的论文，都采取全文翻译的办法，避免因摘译选译的片面和武断而有违作者的原意。第四，为了以最小的篇幅，提供最大的信息量，我们所选的文章一般不超过两万字。

本书的编选校阅工作由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室的俞新天、邓新裕、周锦礪负责。其中第一部分由周锦礪负责，第二部分由俞新天负责，第三部分由邓新裕负责。俞新天负责全书编辑。我们诚恳地感谢全体译者，正是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才使本书能够在短时间内与读者见面。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读者能从本书中获得启发教益，由此而促进我国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同时我们也衷心地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 者

1988年3月7日于上海

本书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室俞新天、邓新裕、周锦礪三位同志合作编选校阅的一部论文集。它汇集了国内外学者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成果，反映了当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本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由周锦礪负责，主要涉及现代化的起源、动力、模式等问题；第二部分由俞新天负责，主要涉及现代化的社会、文化、政治等问题；第三部分由邓新裕负责，主要涉及现代化的国际比较、中国现代化等问题。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力求做到全面、系统、重点突出，力求反映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力求做到观点正确、论据充分、行文流畅，力求使本书成为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的论文集。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领导的支持，也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本书的出版，旨在为从事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学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一般读者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提供一定的帮助。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序 言	(1)
-----------	-------

第 一 部 分

后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	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1)
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因素：论弗 雷德·希尔施和约瑟夫·熊彼特.....	克利尚·库马(25)
未来技术所涉及的国际作用.....	尤金·B·斯科尔尼考夫(58)

第 二 部 分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的意义	弗农·V·阿斯巴图连(82)
工业社会的趋同问题	伊恩·温伯格(103)
——对理论状况的评论	
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苏联的趋同观点吗？	杰弗里·W·哈恩(123)
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的现代化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42)

第 三 部 分

世界体系中的危机与依附关系的转变	安德烈·甘德尔·弗兰克(156)
---------------------------	--------------------

发展经济学：我们学到了什么？

-贾格迪什·N·哈格瓦蒂(176)
- 工业化与发展的估量海伦·休斯(199)
- 国家发展战略的国际联系曼弗兰德·比内费尔德(228)
- 变化世界中的紧张和机会

第一部分

后工业社会的经济问题^{*}

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

6 有一种观点认为,最近几年社会经济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表明我们的历史正在迅速进入一个“后工业”时代的新“阶段”,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不想否认经济领域里正出现结构、制度和行为上的深刻变化,他们的影响会扩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①但遗憾的是,我们用以描述这种现象的后工业这个词已带有某种时髦的性质。^②所以,首先应该尽可能清楚地阐明我们所指的向后工业社会演变的含义,包括澄清它与现在可能正在衰退的“工业”时代的关系,着重说明这个正在来临的时代真正的崭新之处。

* 本文选自詹姆斯·威廉·莫利主编的《未来的序幕——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与日本》,1974年。

① 这种说法是指某种经济决定论者的观点。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我将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② 目前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文献很多——若全部列出,对一个注解显得太长了——在丹尼尔·贝尔的著作里可以找到有关这个概念最精妙的说法,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包括在《展望》杂志1971年冬季号专题论文集里的他的论文;发表在《展望》杂志1971年春季号上的《后工业社会:一个思想的演进》;以及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亦可参考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著作《在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电子时代的作用》(1970年)。赫尔曼·卡恩和安东尼·威纳在《2000年》(1967年)一书中对后工业一词作了更加简明的定量分析。许多书籍引用了这个思想,其中目前被人广泛引用的是阿尔温·托夫勒著的《未来的冲击》(1973年)。

因此，让我们带着怀疑的眼光去探究通常对后工业社会的三种不同理解。

1. 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把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经济的“第三”部门的社会。

后工业主义这个定义促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职业的变化上，这种变化早在 19 世纪就已初露端倪。^① 正如每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整个就业人员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缩小到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在美国，只有 4 %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且在以农业谋生的人员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员是剩余劳动力。同时，由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构成的工

表1 部分西方国家雇佣工人分布的百分比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美 国	1900	38%	38%	24%
	1970	4	35	61
法 国	1950	35	45	20
	1970	17	39	44
联邦德国	1950	24	48	28
	1968	10	48	42
英 国	1950	6	56	39
	1970	4	45	50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资料，第 74 页，经济指数（1972 年）。欧洲国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体基本统计资料（1970 年）〕

① 1811 年，英格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到总数的 1/3，在整个 19 世纪上半叶该处有 1/3 以上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B·R·米切尔，〈不列颠历史统计资料摘要〉（1962 年），第 60 页；S·库兹内斯，〈近代经济的增长〉（1966 年），第 106 页。〕

业“核心”中的劳动力仍大致稳定在约占就业人员的总数 $1/3$ 水平上。^① 其余的就业人数——目前在美国约占就业人员总数的 60% 以上——受雇于提供“最终的”服务业内的各个部门。

各工业化国家的就业人口比例各不相同,但是这种“趋势”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是显而易见的。(见表 1)

由此可见,统计资料能根据社会就业人员转移的情况充分显示后工业社会的定义。但对此略加评论分析还是必要的。首先,纵观各部门雇佣情况,主要变化不是在工业部门发生的。尽管在过去的 20 年里,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比例在英国和法国略有下降,但在德国却保持不变;而在美国,70 余年来的下降幅度则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当代大规模的部门转移与其说是自“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倒不如说是自农业向服务业的转变。^②

此外,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些正在兴起的服务业,在服务业中某些工作正从非赢利性的家庭领域转移到赢利性的商业界。妇女就业明显增加(在美国,适龄妇女就业率从 1890 年的 18% 增长到 1969 年的 30%),造成了服务业“就业”正在增长的假象,因为这些工作以前是在家里完成的,是统计学家所看不到的,而现在则出现在市场上了。洗衣业、餐馆业、专职护理老人业,甚至“福利”业的扩展所表明的服务性行业“就业”的增长有一半是虚假的。

当我们把就业的转移作为琢磨后工业时代含义的基础时,记

① 由于运输业和公共事业是生产无形商品的,故常被归入第三产业部门;而采矿业则被归入第一产业部门。由于它们在整体上和工业的进程都有联系,所以我在这里将它们都归入“工业”部门。

② 请读者注意,对这些统计数字一定要作仔细的说明。例如,农业部门部分就业人数的减少所表明的是农业方面的职业转移到了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比如,正在兴起的农机制造业、化肥业、政府行政部门和私有商业部门。这样,与农业有关的就业人数,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比“正式”从事农业的就业人数还要多。参见 S·莱伯戈特,《经济发展中的人力》,(1964 年),第 111 页。但不管怎样,基本的转移过程还是一目了然的,即摆脱农业,“穿越”工业,进入服务业。

住上述说明及区分是重要的。让我们扼要地概述这些也许可算作告诫的想法吧。

可以推测,在后工业社会制度下,就业变化的重要性在于,主要就业部门的改变使社会开始了新的历程,产生了新的需求。即使不对此假设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也要作一告诫,不要误认为就业变化是由于大批工人脱离工业部门所致。事情并不如此。而是与此相反,职业变化使人们得以“经历”的最根本的变化是从事农业(农场)工作的人数减少和通过市场成交的、与服务行业有关的工作相应增多。工业的“核心”大致保持不变。与一般想象不同的是工业部门的工厂工人——马克思戏剧中的关键人物——在社会劳动整个历程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大致是相同的:不熟练、半熟练和熟练工人,亦即蓝领工人集团,1900年占劳动力总数25.5%,1968年则为34.9%,主要的变化发生在这一集团内部,大多数不熟练工人提高到了半熟练工人水平。这样,即使后工业社会实际上代表了社会经济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其理由也应从别处去找,而不应将某些工业部门不再成为工作环境作为理由。

2. 后工业社会可能与这种现象有关: 用于发展生产的投资发生了本质变化, 从注重量转向注重质。

为了寻求“后工业化”的根本含义,我们应注意许多有关工业化国家内部增长的研究及其多少有点一致的结论:相对劳动力的人数或(不变)资本的数量而言,“知识”在促进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在不断增长。^①根据丹尼森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作此概括,美国在1929年以前的20年中所增加的产量有2/3是通过增加投资及劳动力得到的,而在1929年——1959年的30年里,由此

① 文献太多了,所以不能一一述及。重要的论述有M·阿布拉莫维茨的《1870年以来美国的资源和产量的趋势》(国家经济研究署)1956年;罗伯特·索洛,《技术的变化和集中生产的作用》,《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杂志,(1957年8月);爱德华·丹尼森,《美国经济增长根源》,(经济发展委员会)1962年。

得到的增长是4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1929年前的20年中,改善教育和训练对于增产只有13%的作用,而在1929年以后,这一作用是前一时期的两倍多。结果在上述两个阶段,技术的改善——说到底这毕竟只是知识的具体应用——在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从12%上升到20%。^①

正如丹尼森对一些西欧国家增长原因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些国家中,就业比例也不尽相同,而劳动力大批转移的方向却始终如一。总之,毫无疑问,通过对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的统计调查表明,“与知识有关的”投资的重要性在日益增长,体力性的“劳动力”或者不变资本的绝对量的增加(例如,铁轨的增加)在相应地减少。

鉴于后工业主义的定义是强调就业部门的转移,我无意贬低人力“资本”所具有的重要性。^②然而,无论它多么重要,我仍坚持初衷,对后工业社会的这一特点持某种保留的态度。因为不这样的话,我们在以后研究时就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难题。

首先,我们都已意识到,增长的意义是难以规定,无从捉摸的。那些所谓的国民生产总值其实常常是由集团专断地限定的产量,这与正在使用的任何福利概念都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这些“增长”尽管得力于现代知识之处甚多,却大多很少,甚或没有福利意义:大规模地扩充军备、开发宇宙空间、以及造成严重污染的生产走向了一个极端;而没有意义的发明、风格的

① 丹尼森,《美国经济增长根源》。

② 费伦克·雅诺西,《经济奇迹的终结》,(1971年)。雅诺西有着丰富的想象力,把知识和“劳动力”或者“资本”作比较,说明它们各自的重要性。他要我们想象一下两个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另一个是不发达国家)人口瞬时转移的情况,他假定这两个国家一个是英格兰,另一个是内战前的巴基斯坦。他问道:“巴基斯坦”的人口曲线会迅速向上延伸,而“英格兰”的却会很快下降,这还用怀疑吗?

变换和清除污染的技术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一种是造成祸害或危险的增长,另一种则是虚幻或“防御性”的增长。总而言之,在能把知识投资的增加作为一种值得庆幸的因素,也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加以讨论前,必须把后工业社会增长的质量与工业社会增长的质量作一比较。

其次,在寻找转向知识投资的经济所涉及的问题之前,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入探究知识投资本身正在增长的“事实”。通过探究,我们可以看到知识投资已通过许多途径得到了调整,其中一个途径是大量增加研究和开发。政府的统计资料表明,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约 10 亿美元,增加到了 70 年代初期的 280 亿美元。这个巨大的增额使许多观察家得出结论,现在我们已经使科学发现和应用的过程“制度化”,因此,经济内部动力的本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多持怀疑态度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在最近几年,研究和开发的经费(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呈上涨趋势,这是因为“研究”范围的日常测试或市场销售程序的编制也包括在这些经费内。因此,据估计 1966 年用于新工业产品基础研究的实际经费不是 200 亿美元,而是 10 亿美元。^①

此外,朱克斯,萨沃斯和斯蒂勒曼通过研究,对“制度化的”发明作用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他们引用资料证明,在刚刚过去的发明创造的第三世纪中,重要的发明创造大多由个人或小公司所作。^②这样,认为后工业社会制度化的知识投资和工业社会没有明显的区别是有些道理的。

就所谓的信息革命而言,进一步要说明的是体现在劳动力中

① 约翰·M·布莱尔,《经济的集中》,(1972 年),第 15 页,所引用的估算由兰德公司戴维·诺维克所作。

② 《发明的根源》(1958 年初版,1969 年修订版)。也可参见布莱尔的《经济的集中》,第 215—227 页。

的教育“储备”的兴起。按通常的人均年教育费用标准计算，毫无疑问，这种储备已有明显的增加：在1900年，高中毕业生在17岁年龄的口中只有6%，而在1970年，完成高中学业的人上升到了近80%。同样明显的是，在1900年，在18—20岁的人口中只有4%在大专院校学习，而今提高到50%以上。

现在，没有人否认，就象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一样，这种变化确实预示着一新的展望、经历和前程。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从体现在教育的较高储备这一事实跳跃式地得出社会“知识”的储备也已同时增加这一结论，似乎还嫌过急。因为在增加对劳动力培训的同时，也加强了劳动力技术的区分和专业化程度，比较一下广泛掌握各种能力的农民和工作有所限定因而知识面较狭窄的办公室职员的区别，就是以说明这一情况，与一般想象不同的是，我不能肯定，在后工业社会里，人们在提高正规教育的一般水平的同时，是否还会提高“知道如何做”的一般水平。由于在正规教育方面，把学生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背景之中，“知识”一类的东西必然在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的一般公民与工业社会或前工业社会的一般公民相比，不但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在自然科学、人的行为等经过概括的知识方面确实要多知道一些。然而，在较少概括的知识方面，其收获就要少得多。而在事关社会经济机制运行、极为重要的社会知识的分支范围里，后工业社会专业化教育的特点似乎是除了专业训练，个人工作能力明显减小——甚至还不如一个多才多艺，样样能干，而又样样不精通的农民（或工匠），他们只能眼看着破碎的器皿、抛锚的车辆、损坏的电气产品或者管件装置束手无策。

我们提出告诫，不要简单地把后工业社会看成是一个以“知识爆炸”为特点的社会，并不是要否认较多的教育投资在现代社会内部造成的有目共睹的深刻变化——在未来社会中也许会发生更为

显著的变化，其中首要的是在后工业社会预期会出现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于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仔细考察。不管还有什么其它效果，延长学制的出现似乎总在鼓励人们去期望得到一个与蓝领职业不同的白领职业；这可能也的确违背那些“接受教育”人的意志，他们把许多体力工作视为谋生的适当途径，对于其收入通过与货物，而不是与纸打交道的方式获得，他们并不计较。毋庸置疑，预料中的这个变化和劳动力的实际转移——脱离农业和无技术的工业工种，服务业日益发展——是极为一致的。

其次，也可能更重要的是——尽管多半必然还是推测性的——正在以教育为基础形成一个掌握高度技术的技术员、科学家和专家的“阶层”，他们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影响也正在逐渐扩大。许多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知识精英”的兴起。^①这一新精英所拥有的实际权力究竟有多少，是否超过老的精英还不太清楚，然而，几乎确凿无疑的是，在这一体系的顶端产生了一个新的、以教育为基础的阶层，一种新的、神秘的气氛在包围着“科学家”这一知识型的后工业化制度的象征，这完全可与以前围绕着“工业巨头”的气氛相媲美。^②就此而言，强调“知识”是后工业制度的特征并不错，尽管需要比通常更加仔细地琢磨出这个特征的确切本质。

3. 后工业社会可被视为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说，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的传统问题将让位于一个后工业制度的崭新组织模式。

正如我以前对后工业社会制度的“想象”一样，我认为在这种

① 参见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布热津斯基的《在两个时代之间》，J·K·加布雷恩的《新工业国》，(1967年)和拙著《美国资本主义的局限》，(1966年)。

② 顺便提请注意，被寄予希望的新兴人物就象年老的企业家一样，也有矛盾之处，既是一个能够创造一个伟大社会的英雄人物，又是一种摧毁这个社会的恶魔势力。

看法中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核心。19 世纪末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严重阶级差异似乎正让位于一个在经济方面（即使社会或政治方面不一定）极为一致的社会。“福利”国家尽管事实上名不副实，终已成为现在所有的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模式，并在确保收入、家庭津贴、公共卫生保险，对低薪阶层实行教育补助以及诸如此类的方面，带来了很大程度的“社会主义”。因不能增加需求而造成的制度的极度脆弱，由于公共部门的扩展而得到弥补。由于上述情况以及其它的一些变化，“革命的”无产阶级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况且如前所述，工业无产阶级的规模几乎原封不动。

于是，就有充分理由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与其所继承的工业资本主义在经济行为的重要方面有所不同的社会。然而，象以前一样，在设法描述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本质时，诚如找出其区别那样，找出其连续性也是明智的。

其中最主要的趋势是一个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50~70 年代中期的持续不断的趋势。这是一个缓慢的、不规则的、但是显然是不可逆转地朝着资本集中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下面的统计数据是众所周知的：在制造业方面，1968 年 100 个最大厂商的资产占了全部制造业大公司资产的约 49%，这相当于 1950 年 200 个最大的工业厂商所占的比例。同时，1968 年的 200 个最大厂商在全部资产中控制的部分相当于 1941 年的 1000 个最大的厂商在总资产中所占的份额。^① 罗伯特·艾伯里特一目了然地描绘出了经济社会的特征，把庞大而强有力的企业称作圆心，而把数量极多的小、弱厂商称作圆周。^②

① 布莱尔，《经济的集中》，第四章。

② 艾夫里特，《二元经济》，1968 年。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我们还没有理解在整个体系的运行分成这两个部分后所呈现的态势。事实表明，实行垄断的圆心是导致经济无效甚或通货膨胀的根源；^①至少有一个研究者证实，延伸出去的圆周则是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②更为重要但却难以弄清楚的是，将这圆心和政治权力结构绑缚在一起的连接物的范围和性质。尽管许多事例证明这种连接物是存在的，但是权力的流动方向（从经济结构流向政治结构，或方向相反）还不太清楚，或许还不太稳定。^③这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存在着一个以某种方式与一个政治上的集权结盟的经济集权——这种情况基本上和“工业”社会存在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顺便说说，在日本、法国、德国和其它即将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里，我们同样能看到这种经济政治的协约。^④

后工业社会的就业或教育结构的发展似乎并不可能改变经济集中这一特征。更可能的似乎倒是这一集中将会在正在急剧发展的服务部门中迅速进行，服务业现在受到它的严重侵袭（在仍是最少集中的农业部门，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想把服务业描写成一个由大量独立的业主（律师、不雇他人的商户，单人企业）组成的行业；但实际上在服务部门，相当比例的就业机会是由一些垄断组织所提供的。在1970年，从事服务业的大约有4400万人（不包括公用事业或运输业），其中1300万人在政府部门工作；1500万人从事商业，400万人从事金融业（银行，经纪业，不动产业）。相对而

① 布莱尔，《经济的集中》，第152页，在此书的其它地方也到处可见。

② 霍德华·谢尔曼，《激进的政治经济》，（1972年），第110页，113—114页。

③ 与此有关的一些研究：可见《美国经济学会会刊》，1972年，第279—318页，尤可见考夫曼和梅尔曼所写的文章；罗伯特·恩格勒的《石油政治》，（1961年）；G·科尔科的《美国多元主义的衰落》（1961年）。

④ 参见A·舍恩菲尔德的《近代资本主义》（1965年）。